

论开放条件下的产业发展战略选择

贺俊

摘要: 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开放环境必将从各个层面深刻地影响中国经济, 如何在正确的战略指导下实现开放环境中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将是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拟在对既有产业发展战略进行评述的基础上, 提出在开放和制度转型的新的经济背景下我国应采取的产业发展战略, 并对实施该战略的原因和条件加以分析。

关键词: 开放 竞争优势 比较优势 幼稚产业

一、引言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 中国基本上遵循苏联模式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产业发展战略。在这样的战略指导下, 政府利用严格的价格管制、强制性命令等行政手段优先将资源配置到重工业部门, 使得重工业迅速建立和发展起来, 从而有利于我国在短期内建立起完备的工业体系, 这在当时严峻的国际政治环境下是有意义的, 同时也为日后的产业发展奠定了一定的重工业基础; 但另一方面, 过度地发展重工业也造成畸形的产业结构、严重的城乡差距等深层次的经济问题, 进而影响了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速度和质量。改革开放以来,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份额日益扩大, 资源在价格信号和市场需求的引导下流向了其他工业部门、建筑业和第三产业, 比较完备的产业体系基本上建立了起来, 整体的买方市场已经形成。但是, 由于过渡经济的特殊性质, 要素价格、产品和劳务价格(特别是要素价格)的制度性扭曲仍然较为严重, 国有企业尚不具备完全的市场行为, 民营企业和乡镇企业仍面临较高的行政型产业进入壁垒, 导致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不充分; 与此同时, 现实的经济条件和政府产业政策实施的不得力使得政府始终期望发展的所谓“主导产业”和“重点产业”并未在国民经济中起到主导和重点的应有作用, 因而整体的产业素质仍很低。本文无意对传统产业战略的实绩进行评价, 但目的却在于强调在日益开放的经济环境下, 特别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迫近, 中国经济发展的条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因而必须采取新的产业发展战略。应该认识到, 尽管过去的中国经济经历了不断开放的过程, 但过去的经济发展整体上仍然是在封闭或准封闭的环境下进行的, 因而经济发展主要是通过国内市场的分工实现的, 随着中国加入WTO, 中国的企业和产业将被逐渐纳入到国际市场的分工体系当中去, 开放条件将从企业、产业和宏观经济运行等各个层面深刻地影响未来中国经济的走向。在新的开放环境下, 中国的产业发展战略必须进行调整, 而且新的产业发展战略必须与中国的制度转型相容。只有在新的符合我国现实经济条件的产业发展战略的指导下, 开放条件才能尽可能地转化为推动中国经济继续稳定发展的积极因素, 制度转型也才能较为顺利地深入进行。

二、对既有产业发展战略的评述

针对中国过去存在的经济问题和面临的新的经济形势, 学术界提出了不同的产业发展战略。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是赶超战略和比较优势战略。主张赶超战略的人强调主导产业和重点产业对经济的带动作用, 进而强调政府在产业发展中的作用; 持比较优势战略的人则强调从中国的资源禀赋出发, 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进而达到经济长期增长的目的。

赶超战略主要是以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市场失效”和发展经济学中的“后发优势”为理论依据的。这种观点认为, 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是一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必要条件, 而高附加值、高关联度的主导产业和重点产业的成长则是一国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重要内容; 但是, 由于这些产业在发展中国家都是尚不具备自生能力的幼稚产业, 所以需要运用政府强有力的产业政策对这些产业加以培育和扶植, 同时, 鉴于这些产业已经形成的国际性的寡头垄断市场, 政府有必要利用关税、配额等手段对幼稚产业进行保护, 以通过主导产业和重点产业的发展带动整体产业竞争力的提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扶持主导产业和重点产业的发展一直是我国产业政策的重要内容, 如经过长期讨论于1994年颁布的《90年代国家产业政策纲要》明确指定机械电子、汽车、化工和建筑四个行业为支柱产业, 并制定了相关的优惠政策。但是几年来这些产业的整体发展绩效并不能令人满意, 即使某些产业中的部分行业(如家电行业)发展得较好, 也主要是市场竞争推动而非政府扶持的结果(江小涓, 1996)。究其原因, 主要有: 政府并不具备推动产业发展的动力(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往往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制定和执行政策)和能力(政府不能判断主导产业和重点产业选择的合理性以及不能有效地实施产业政策)(江小涓, 1996); 更为重要的是, 由于这些主导产业都是资金密集或技术密集型的产业, 而作为欠发达国家, 我国的资金短缺, 整体技术也很落后, 所以我国并不具备发展这些产业的比较优势, 资源禀赋条件客观地决定了这些产业不可能在现阶段获得充分的发展(林毅夫等, 1999)。

针对赶超战略的种种弊端, 有学者提出中国应施行基于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战略, 即优先发展反映我国要素禀赋条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林毅夫等, 1999)。这种观点主要是以

李嘉图的古典“比较优势”贸易理论和赫克歇尔-俄林的新古典“资源禀赋”学说为理论基础,并在对中国的现实经济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其重新加以诠释。该观点认为,经济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产业结构升级是要素禀赋结构提升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只有当产业能充分利用其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时,才能以较低的生产成本进行生产,从而在国际竞争中具有较强的竞争力,这样,该产业创造的社会剩余也才会多,资本的不断积累就能够提升要素禀赋结构,进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同时,该理论认为赶超战略会内生地导致要素价格的制度性扭曲,而比较优势战略内在要求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所以,比较优势战略是与我国进行的制度转型相容的。因此,在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上,都必须发挥当时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而不能脱离比较优势进行赶超。就我国而言,当前应通过充分竞争的市场机制积极发展体现比较优势的服装、玩具、组装加工等产业,政府则应主要致力于基础设施部门的建设,以降低经济活动和市场机制运行的交易成本。应该说,从“要素禀赋”和“制度相容”两个角度提出的比较优势战略在我国融入国际市场分工体系和制度转型的背景下具有重要的意义,但笔者认为,该理论仍存在以下不足之处:(1)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认识存在偏差。一方面,产业结构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但另一方面,由于产业之间的错综复杂而又异常紧密的投入产出关联性,产业结构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2)夸大了市场机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在开放条件下,国内的企业和产业将直接迎接来自国际市场的竞争,市场的一体化将进一步强化规模经济较为显著的产业的发展,即使将来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进一步提升产业结构所要求的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面对国际寡头垄断市场也将很难发展起来;(3)夸大了比较优势产业发展的重要性和现实性。尽管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在新兴工业化国家(如日本和“亚洲四小”)的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必须认识到,今天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已变得异常激烈,如果中国经济过分依赖于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风险将变得太大。鉴于以上原因,笔者认为比较优势战略也不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赶超战略与比较优势战略的观点各执一端,但都希望从经济学的角度对“东亚奇迹”的发生予以解释,并都试图从东亚发展的历史经验中寻找佐证。以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 Alice Amsden 和英国经济学家 Robert Wade 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这些经济的成功是由于政府有意识地扭曲价格,限制市场的作用,利用产业政策来扶持某些关键性的战略产业,因而赶超战略是东亚迅速发展的原因。而持比较优势战略的学者则认为,是基于资源禀赋比较优势的比较优势产业的发展导致“东亚奇迹”的发生。有趣的是,两种观点的争论最终都归结为“市场”与“政府”在东亚发展中的作用,而这也正是中国在整个转型、发展和开放过程中始终面临又难以解决的问题。在对两种既有的产业发展战略进行了概要评述的基础上,笔者认为,以形成可持续的竞争优势为导向的产业发展战略是中国制度转型、经济开放条件下的现实选择。

三、竞争优势战略的内涵

本文中提到的“竞争优势”基本等同于“国家竞争力”的概念,即一国的竞争优势是指该国创造增加价值的 ability 以及增加国民财富的能力,它最终体现为人均国民收入的增加,在宏观经济的层次上表现为持续的、较为稳定的经济增长,

世界经济的历史证明,国家的竞争优势是通过建立在生产效率提高基础上的一国产业规模扩张和产业结构升级来实现的。开放条件下,以国际市场需求为导向的产业规模扩张和产业结构优化保证了一国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的不断降低,进而确立该国在国际市场分工体系中的竞争力地位。

无论是发挥比较优势还是争取赶超,都是为了形成国家的竞争优势,而产业的竞争优势与不断优化的产业结构则是一国竞争优势的基础,因而以可持续的竞争优势为导向的产业发展战略主张,在一国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上,都必须有能够带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且具有国际市场竞争力的产业的发展,该战略强调建立在动态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的有序更替;但必须注意,产业的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因而每一个经济发展阶段又必须为下一个阶段的产业发展奠定一定的基础。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又是提升国民经济竞争优势的最终途径。因而,在目前我国处于劳动要素比较优势的经济发展阶段时,一方面,要在积极推动制度转型的条件下大力发展当前具有国际市场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另一方面,要适当地利用国家的产业政策,有选择、有重点地扶持幼稚产业的发展,使其成为未来带动结构升级的经济增长点(关于幼稚产业,我们将在后文中加以详述)。可见,竞争优势导向的产业发展战略具有如下特征:(1)竞争优势战略是一种着眼于长期的动态发展战略。它区别于赶超战略的地方在于其强调现阶段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的资源禀赋制约,它区别于比较优势战略的地方在于其强调每一阶段主导产业发展的连续性和现实性;(2)竞争优势战略内在包含比较优势的内容。竞争优势战略并不排斥发挥比较优势,相反,它强调现阶段对幼稚产业的适当保护是为了在下一个要素禀赋阶段更好地发挥比较优势。可以说,竞争优势战略追求一种动态的比较优势;(3)竞争优势战略符合目前我国的制度转型的要求。大力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要求加快这些产业中的企业改革和减少政府的行政性管制,以形成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而在完善的市场机制尚未建立起来之前,适当的产业政策和既有的国有经济基础有利于幼稚产业在现阶段的培育和发展。

最后必须加以澄清的是,竞争优势产业发展战略不同于“均衡的”或“温和的”外贸发展战略。首先,竞争优势战略是整体的经济发展战略,而均衡的外贸发展战略则属于贸易战略的范畴。其次,本文提出的竞争优势战略强调适当的产业政策的实施,而均衡外贸战略则重视贸易手段(如关税、配额)的运用,政策手段的不同使得均衡外贸战略的现实性大打折扣。再次,竞争优势战略下的幼稚产业也不同于均衡外贸战略中所指的比较劣势产业,前者更加强调其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带动作用,因而较后者更具长远的战略性。

四、竞争优势产业发展战略指导下比较优势产业的发展

我国仍处于劳动要素具有比较优势的要素禀赋阶段,因而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是现阶段实施竞争优势产业发展战略的主要内容。按照要素在产业中的相对比重,可以将产业粗线条地划分为土地密集型、能源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五种产业类型。我国的人口规模大,土地和能源都相对短缺,让土地密集和能源密集的产业成为经济主体显然是不现实的;资金的相对缺乏和整体技术水平的相对落后使得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的产业也不可能

成为现阶段带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而丰裕的劳动资源、既有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基础和尚可技术改进和制度改革拓展的产业发展空间等条件则使得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是我国处于劳动要素具有比较禀赋优势阶段时推动经济增长的理想选择。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大力发展将极大地吸收我国城乡中存在的大量富余劳动力,就业率的提高和城乡劳动要素的重新配置能推动产出的增加,而国民收入的提高将为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升级积累必要的资本。

在过去的20年里,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获得了相当的发展,但仍存在许多问题,如国有经济在这些产业中的比重过大严重影响了生产效率的提高,政府对这些产业的过度干预使得对市场反映灵敏的民营企业和乡镇企业仍面临较高的产业进入壁垒,各类市场转轨的不同步和地方保护主义导致严重的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等。当然,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和日益开放的环境也正是我国比较优势产业进一步发展的契机。

1. 充分竞争的市场机制的形成

充分竞争的市场机制是比较优势产业发展的制度基础,充分竞争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动力,市场机制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制度保障。企业只有在竞争的压力下才会在能够反映生产要素相对稀缺性的要素价格的指引下,利用具有比较成本优势的要素和适用技术进行生产,因而在完善的市场机制下,微观企业主体追逐利润的过程,也就是比较优势产业发展的过程。因而,今后发展我国比较优势产业主要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逐步取消政府对要素市场的管制,使市场价格充分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政府主要致力于建立市场规则和实施反垄断法,保证价格信号和比较优势信息不被扭曲,从而企业能够按照比较优势进行投资决策。可见,政府在发展比较优势产业中的职能主要是保护竞争,让价格机制发挥最充分的资源配置作用。同时,要着力消除地方政府的地方保护主义行为,形成全国统一的,实现资源在全国大市场的优化配置;另一方面,要着力培育比较优势产业中的微观市场主体。我国20年改革的历程证明,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对我国比较优势产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已有研究证明,乡镇企业在生产效率方面超过国有企业,主要是因为乡镇企业具有自身的经营自主权和激励上的优势,同时,乡镇企业有效地利用了国有企业的经营和技术资源。因此,今后应在消除行政性进入壁垒的基础上进一步鼓励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进入比较优势产业,同时,以破产、兼并等多种形式使国有企业逐步退出比较优势产业,将经营和技术资源直接转移到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中,以提高这些资源的利用效率。当然,乡镇企业也存在“模糊产权”等影响乡镇企业长期发展的深层问题,随着转轨过程的推进,相应的政策法规也应及时出台,规范乡镇企业的产权结构和市场行为。

2. 提高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质量

尽管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获得一定的发展,但过去的发展基本上还是一种以规模扩张为主的外延型成长方式,产品的附加值较低,产业的生产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今后,应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等新技术的发展,加快对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改造。新技术的发展不是独立的,技术的产业化才能最终让新技术获得生命。运用新的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的改造是传统产业未来发展的方向。就我国而言,信息技术在我国传统密集型产业中应用的空间还很大,技术改造可以保证生产成本的不断降低和产品附加值的增

加,从而提高我国比较优势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同时也可以带动我国整体的技术进步。此外,强调比较优势产业的发展也并不是指我国只能发展如纺织、服装、玩具、皮革、工艺美术等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事实上,中国的企业在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甚至高新技术产业中的具有劳动密集性质或通过劳动替代具备竞争力的部分产品和生产环节也可以有所作为。正如北大方正集团的王选教授所言:在计算机行业里,目前赚钱最多的是基础软件和操作系统,但中国在10年内不可能进入这些领域,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实力在这些最赚钱的领域中与外国大公司争夺市场……北大方正的战略是先在一些不大不小的领域做深做透,然后向世界市场发展。拿IT行业来说,国内企业可以大力开发IT的硬体产业中以组装为主的产品和部分针对国内用户的软件产品,同时努力消化吸收国外比较成熟的先进技术并加以改造,逐步由主动的国际分工走向积极的国际竞争。比较优势的原则不仅适用于整个经济的各产业之间,也适用于产业内部的各个生产环节。

五、竞争优势产业发展战略 指导下幼稚产业的发展

正如前文所述,竞争优势产业发展战略并不排斥幼稚产业的发展,相反,幼稚产业是保证形成动态竞争优势的重要条件。

1. 发展幼稚产业和保护幼稚产业的理论依据

历史上,三个最大的市场经济国家都是在政府的政策扶持下开始它们的工业化进程的:美国和德国在19世纪对制造业产品征收高额关税,而日本直到20世纪70年代仍保持很大范围的进口控制。当然,时至今日,传统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国际市场已经相当成熟,加之中国尚不具备资金和技术的资源禀赋比较优势,因而,发展幼稚产业必然是相当困难的,但理论和我国的现实经济条件决定了我国具有发展某些具有战略性的幼稚产业的必要性和现实性:(1)幼稚产业的发展是优化一国产业结构的重要条件。幼稚产业的发展能够为比较优势产业的发展提供必需的资本装备和技术,而且,起步阶段面向国内市场的幼稚产业更能提高设备和技术的适用性。(2)幼稚产业在现阶段的发展是下一阶段主导产业发展的基础,现阶段的幼稚产业在资本和技术具有资源禀赋比较优势阶段时将可能发展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3)边干边学产生的“动态收益递增”。由于学习效应的存在,一国产业的累积产量越大,则其平均成本也就越低。这意味着一国只要有更多的生产经验就可以生产成本低的产品出口,因而为了增进社会的长期福利,政府可通过政策扶持来鼓励该产品的生产或排除外来竞争以保护该行业直到它在国际市场站稳脚跟。(4)尽管幼稚产业在现阶段的发展要求适当的政策扶持,从而内生地导致政策性扭曲以及随之产生的资源误置成本,但中国是一个大国经济,大国经济使得中国存在一定的承受政策性扭曲成本的空间。当然,保护政策要适当,以尽可能减少这一成本。

对幼稚产业进行保护的理論依据主要是两种“市场失效”现象的存在,即不完全的资本市场和无偿占用问题。不完全资本市场依据是指:发展中国家不存在完善而发达的资本市场(如高效的股票市场和银行)将资金转化为幼稚产业的投资,幼稚产业的成长会受到这些产业当前赢利能力的限制。因此,在资本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可以利用政策手段执行资本市场的长期投资职能,以加快幼稚产业的成长;无偿占用问题是指:幼稚产业中新进入的企业必须为技术研究开

发、培训人员和生产管理付出开拓性成本,但是知识的“外溢”和人员的流动性使得后进入企业可以无偿占有开拓企业创造的社会收益,因而,政府应该以优惠政策鼓励企业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更为根本的是,幼稚产业的发展并不符合发展中国家当前的资源禀赋优势,所以必须依靠政府的政策手段人为将资源引导到这些产业中去。

2. 幼稚产业选择的原则和标准

过去,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产业政策以鼓励部分产业的成长,但是由于政府产业政策覆盖的范围太广,加之比较优势产业发展的不充分,因而主导产业和重点产业成长缓慢。因此,今后战略产业的选择要坚持“少而精”的原则,以尽可能减少政策性扭曲成本,具体而言,战略产业的选择要秉持以下标准:(1)产业的关联度。扶持战略产业的目的在于带动产业结构的升级,因而战略产业必须具有很高的关联度;(2)国际市场需求原则。战略产业是未来在开放环境下带动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因而必须具有广阔的国际市场前景。(3)既有的产业基础。过去20年里,中国的部分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已经有一批具备一定国际竞争力的企业成长起来,战略产业的发展应充分利用既有的基础,争取使这些产业和企业由积极参与国际分工走向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最终具备在国际市场进行竞争的能力。考虑到以上标准,笔者认为,小轿车、装备工业、电信、机电一体化产业可作为实现我国产业动态竞争优势的幼稚产业予以大力发展。

3. 幼稚产业发展的条件

(1) 幼稚产业发展的政策选择

促进幼稚产业发展的政策主要包括关税、配额、出口补贴等贸易政策手段和信贷、补贴、税收优惠等产业政策手段。随着中国加入WTO,关税等贸易手段将受到WTO有关协议的制约,中国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名义平均税率仍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所以,中国“入世”的首要义务就是要逐步将中国关税加权平均水平降到关贸总协定要求的发展中国家水平,并将最高关税一般地约束在15%以下,这意味着利用贸易政策对幼稚产业加以保护的空間将变得很有限。另外,关税等贸易手段主要是通过限制进口而起到保护作用的,企业的效益只有通过市场和广大消费者间接获得,企业提高效益的压力和动力相对较弱;而国家产业政策对某些生产部门给予投资、信贷、财税、技术研发、政府优先采购等方面的扶持,比贸易政策保护更直接有效。所以,今后政府对幼稚产业的扶持应以产业政策为主。此外,产业政策要改变传统的“普惠”方式,而代之以企业导向的产业政策,加强对优势企业的扶持。

利用产业政策对幼稚产业进行保护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孩子产业获得将来在国际市场中的自生能力和竞争力,因此,必须注意保护性产业政策的时间性,政府应尽可能明确产业政策的各项措施,提高企业对政策的预期,减少企业对政策的依赖性。

除了积极的产业政策外,政府还应以调动民间资本和加大直接投资等方式加强卫生、交通运输和能源等初始投资规模大、项目周期长的基础设施部门的建设,特别是通过大力发展教育来提高社会的熟练劳动和高素质劳动的人力资本存量,以适应幼稚产业发展的需要。

(2) 幼稚产业发展的产业组织基础和制度基础

产业自生能力的培养和竞争力的提高根本上还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实现,所以,充分竞争的市场结构是幼稚产

业发展的产业组织基础,保障充分竞争的制度环境和具有完全市场行为的企业主体则是幼稚产业发展的制度基础。鉴于幼稚产业通常都是规模经济比较显著的产业,因而,无论是产业政策的实施还是反垄断法的执行都应考虑形成“寡头竞争”的市场结构,以推动幼稚产业的发展。由于既有幼稚产业中国企业所占的比重比较大,所以政府应在积极促进国有企业重组的同时,通过国资变现、增资扩股实现股权多元化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对于有条件的民营企业要积极鼓励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以促进市场的竞争。

最后,笔者将以李斯特的一句话同时也是竞争优势产业发展战略的思想基础来结束全文:“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多少倍。”

注释:

林毅夫等提出,“日本和‘亚洲四小’在其不同的发展阶段上,由于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不同,因而形成的主导产业也是不一样的。一个共同的规律是,随着经济发展,资本积累、人均资本拥有量提高,要素禀赋结构得以提升,主导产业从劳动密集型逐渐转变到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乃至信息密集型上面。”但也必须认识到,任一阶段的主导产业的形成都不是“空中楼阁”,而是在前一阶段的既有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因而,简单地否定前一阶段政府促进主导产业发展的产业政策有失客观。正如著名国际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所言:“如何评估产业政策的效果仍然是需要研究的一个主要课题。”

参见张幼文:《外贸政策与经济发展》,85~87页,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

刘德强等:《中国的工业改革》,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由于科技要素对传统生产要素的质量和类别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以功能划分,生产要素的类别应当细化。原先的资本和劳动两要素模型已不适用于描述国际间分工和贸易分工的格局了。不仅比较优势呈阶梯型分布,同种生产因素的质量也有阶梯型差异。”吴健伟:《国际间产业竞争与市场容量》,294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学习效应是指,在长期的生产过程中,企业的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者可以积累起有关生产、技术设计和管理方面的有益经验,从而导致长期平均成本的下降。

所以,通常作为幼稚产业选择标准的高附加值、高就业等因素并不能作为竞争优势产业发展战略下幼稚产业的选择标准。

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文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参考文献:

1. 江小涓:《经济转轨时期的产业政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2. 郭克莎:《中国工业化的进程、问题与出路》,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3)。
3. 林毅夫等:《比较优势与发展战略》,载《中国社会科学》,1999(2)。
4.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发展战略研究组:《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回顾与展望》,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内部讨论稿,2000。
5. 克鲁格曼和奥伯斯法尔德:《国际经济学》(第四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6. 海闻:《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发展》,载《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7. 刘德强等:《中国的工业改革》,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8. 洪银兴:《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载《经济研究》,1997(6)。
9. 吴健伟:《国际间产业竞争与市场容量》,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10. 樊纲:《全球化中的不平等问题》,载《国际经济评论》,2000(3)(4)。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北京 100102)
(责任编辑:陈永清)